

[德] 菲利普·范登贝格 著
徐新 丽洁 艺馨 译

Philipp Vandenberg

神秘的档案

Die Akte Golgatha

最畅销的德语作家
惊悚 悬疑 文化
耶稣遗骨找到了……

华夏出版社

[德] 菲利普·范登贝格 著
徐新 丽洁 艺馨 译

Philipp Vandenberg

神秘的档案

Die Akte Golgatha

最畅销的德语作家
惊悚 悬疑 文化
耶稣遗骨找到了……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档案/(德)范登贝格著;张丽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80-5108-6

I. 神… II. ①范…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102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5157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装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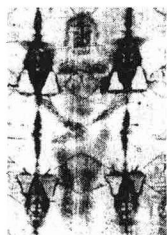
880×1230 1/32 开本 10.75 印张 300 千字 2 插页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这是一次恐怖的飞行，而一切的初始全然没有任何征兆。下午三点钟整，汉莎航空 963 航班在秋日的艳阳下准时起飞，飞行航线是横越阿尔卑斯山脉后抵达罗马，这原本会是趟愉快的空中之旅。我在坐落于阿尔巴山麓的蒂沃利^①预订了一家小旅馆，期望在那个远离尘嚣、风景如画的地方构思我的新小说，小说的素材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萦绕两年多。谁能想到，后来竟然发生那样的事情。

刚刚飞过阿尔卑斯山脊，汉莎航空的这架最新机型的空中客车猛然开始颠簸摇动。座椅上方“请扣好安全带”的指示灯闪烁不停，从机舱喇叭里传出机长的指令：“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不要离开座位，扣好安全带。意大利上空出现一股低气压旋涡，我们将遭遇强烈的气流。”

说到飞行体验，我算不上勇敢——在非洲和亚洲我也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惯于在飞行期间一直扎着安全带。怀着不安，我贴窗看向外面灰蒙蒙的云团，天空阴沉昏暗，飞机的摇晃越来越猛

^① 蒂沃利，位于罗马以东约三十公里处。

烈，如果我说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满不在乎，那我就是在撒谎。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小戏法，那是好多年前在一次飞往加利福尼亚途中一位美国心理医师教我的：把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物件攥在手心，用力握，直到感觉疼痛，集中于痛感的注意力会让人忘掉置身于上千米高空的恐惧。机身又是一阵剧烈的起伏。我在外套口袋里刚好摸到一张信用卡，我死死攥着它，一时间似乎右手握在刀刃上。

我恍惚觉得座椅靠背后面小桌子上的玻璃杯、托盘和刀叉像是蓦地脱离重力的吸引，它们向上漂移，撞到舱顶，然后就仿佛粘在上面。机舱里的乘客此起彼伏地发出惊慌失措的喊叫。受一股急速旋转下沉的涡流的裹挟——飞机在向下掉。

这种失重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手里攥着信用卡。突然我从自我催眠中被惊醒：右侧的邻座，迄今为止我都没有留意过的那个人冷不防地抓住我的手臂，牢牢不放，似乎这是他在极度恐慌下找到的唯一依靠。我瞅向他，他的眼睛怔怔地目视前方，面如土色，嘴巴微张，灰白的髭须在颤抖。

这样的径直坠落大概持续了十秒钟或许是十五秒钟才停止——在我却宛若无休无止一般——飞机突然一顿，然后就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原来贴到舱顶的东西掉下来砸到一些乘客身上，引起一声声惊呼。接下来飞机终于开始平稳，继续前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刚才太失礼了，”这时邻座才松开我的手臂说道，“我真的以为我们就这么掉下去了。”

“没关系。”我豁达地回答，心里想着该如何把依旧隐隐作痛、还攥着有如刀片的信用卡的右手藏起来。

邻座和我一样侧耳倾听着机体的响动，唯恐再次遭遇新的气流。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您坐飞机从不害怕吗？”

那您可就错了，我本要脱口说出，但又担心如果我这样回答，剩下的旅途时间恐怕要白白耗在交流彼此恐怖的飞行经历上，于是我敷衍了事地简短回答：“是呀。”当我再一次端量他，我发现他的另一只手把一摞手稿或者是笔记之类的东西紧紧搂在怀里，就像孩

子唯恐被人抢走他心爱的玩具一样。后来他招呼一名空姐过来，一个相当漂亮的黑发姑娘，他竖起食指和中指，要了两杯威士忌。“您也来一杯吧？”他对我说。

“不，谢谢，我不喝威士忌。”我谢绝道。

“没什么大碍，经历了这么恐怖的事情就是两杯我也喝得了。”

我右侧的这位邻座不紧不慢地呷了两杯威士忌，绝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一口气灌进肚，使得我有机会进一步地观察他。

他看似聪慧的脸孔和脚上那双昂贵的皮鞋与他略显随意的衣着打扮有些矛盾，而他奇怪的行为也让我捉摸不透：这个中年人属于敏感的那一类型，毛躁的动作和神经质的举止，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他似乎觉察出我在打量他，因为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又把脸朝我转过来，在座位上挺了挺腰板，微微躬身，这样的姿势未免有点可笑，他彬彬有礼地说：“我叫格鲁皮乌斯，格伦高教授，不过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俯下身，把文稿塞进搁在坐椅下面的棕皮文件包里。

为了不失礼，我随后告诉他自己的名字，纯粹是出于好奇，我问他：“该怎么理解，教授先生，您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格鲁皮乌斯摆了摆手，表示他不愿多谈此事，可是因为我继续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他只得说道：“我是名外科医生——或者说这样说更准确，我曾经是外科医生。那么您呢？——等一等，让我猜猜看……”

这让我稍感不太自在，但是对话已经起了头，而我依旧被安全带捆绑着靠窗端坐，坐姿像是有人要给我拍照一样，我面带笑意地看着他。

“您是位作家？”格鲁皮乌斯冷不丁说道。

我一惊：“没错，您怎么知道？您看过我写的书吗？”

“坦白讲，没看过，但是我之前听说过您的名字。”格鲁皮乌斯微笑着说，“您去罗马干什么？是为了一部新小说吗？”这个刚才还面色死灰几乎就要瘫倒在我身上的人突然一下子活跃起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接下会有什么事，十个人当中有九个对他所遇到的作家

说：“如果我给您讲一遍我的故事——您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不过后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对话，教授单单只问了这一个问题。

“我根本不是去罗马。”我据实回答，“我在机场租了一辆车，然后径直开到蒂沃利。”

“啊呀，蒂沃利。”格鲁皮乌斯颇有感慨。

“您去过蒂沃利？”

“仅仅从图片上看到过，那里的风光实在太美了，啊，蒂沃利。”

“在这个季节尤其安静。我认识那里的一家小旅舍，‘桑皮耶罗’，在特雷图广场附近，那家的老板娘是个典型的意大利老嬷嬷，她烹制的意大利面那才叫绝顶美味，而从旅舍的露台上眺望，远处的一切美景尽收眼底。我想在那个地方创作我的新长篇。”

格鲁皮乌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真是个好职业！”

“是的，”我回答说，“没有比这个工作更好的了。”

我原本早该醒悟过来的，其实教授对我准备写的新小说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而我好像是冒犯了他，因为我紧接着根本没有反过来询问他为何出门旅行，对他的生活状况也没流露出什么兴致，他只是又一遍地说：“请不要怪我刚才那样子死死拽着您不放！”然后他就突然中断了我们的谈话以及进一步的交流。

“都过去了！”我安慰他说，“如果能让您感觉好受些。”

机舱喇叭响起通告，几分钟后此次航班将降落在列奥那多·达·芬奇机场。没多久，飞机平稳着陆。

在机场大楼我们各自分头而去。我感觉得到，这段小小的插曲让格鲁皮乌斯十分狼狈，而对我来说，这件事到隔天早晨差不多就忘掉了，之所以是差不多，全因为我对教授的说法——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时让我心里面感觉怪怪的。

早饭之后，我拿起一摞白纸——这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都是挑战——坐到绿色漆面木桌子旁，旅舍老板娘莫雷蒂太太帮我把桌子抬到露台的栏杆前。从这里可以俯瞰到蒂沃利的一排排屋顶，再向西看去，在秋日的云雾缭绕当中隐约可见罗马城。

我埋头致力于我的小说创作，中途只出去做个长时间的散步，写得很顺利。第五天，正当我顶着正午的日头撰写最后一页草稿时，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向我踉跄地走来，稍后又停住了。我能感受到驻留在我脊背上的目光，这很令人不舒服，于是我扭过头去。

“教授，怎么是您？”我诧异地把笔放到一边。我的思维还深深地沉浸在创作的情绪当中，所以我当时回头望向他的眼神一定是充满困惑和不解。格鲁皮乌斯相当笨拙地向我招招手试图来抚慰，之后他用一种只有具备很高修养的人才善用的文雅言辞向我致意，接着把话题转到他的来意上。

“您大概很惊讶，我为什么来这里找您。”我给他搬来一把椅子，他有些僵硬地坐下来，然后开口说道。

我耸耸肩膀，表示对此我并不在意，不过马上我就对我刚才的表现后悔不迭了，但这也沒什麼好奇怪，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从几天前我们在飞机上偶然相识，教授还是第一次用这种严肃、坚定的目光看着我。“我需要一个知情者！”他说话的语调很轻，口气却是相当迫切，以至于让这么几个简单的字也变得神秘起来。

“一个知情者？”我奇怪地问，“您为什么偏偏挑中我？”

格鲁皮乌斯向四周觑视，好像他担心有人听到我们的对话似的。我立马就明白了，他在害怕什么，而且要回答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似乎也不太容易：“我知道，我们算不上熟悉，原本我们就不认识，鉴于我目前的境况，这倒成了某种优势。”

“您说什么？”——我必须承认，事后回头去想，我那时的态度真算得上相当傲慢，不过我现在也很庆幸，我没有依照我的本性去应对。这位教授躲躲闪闪的言辞让我颇为不耐烦，我简直要脱口而出：我亲爱的教授先生，您占用了我的时间，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再见。——好在这些我并没有说出口。

“我考虑了好久，该不该用我的故事来烦扰您，”格鲁皮乌斯接

着说，“可您是一位作家，一个善于想象的人，而如果您能想象出我决心跟您讲述的事情，那可真的需要您发挥出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来。但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虽然听上去那么的不可思议。或许您根本不相信我，把我视作疯子或者喝醉酒胡说八道。说句心里话，要在一年前连我自己听到这事也不会有别的反应。”

教授这一番恳切的话语让我无言以对。再说，我的胃口也一下子被吊了起来，起初的犹疑被好奇心驱散，兴致大增，很想听听这位古怪的教授到底想说什么。“您知道，”我说，“最好的故事常常是由生活本身所书写。另外，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就是善于倾听，毕竟我靠编故事谋生，坦白来讲，我对此甚至很热衷。好了，您究竟要说什么？”

教授解开外衣纽扣，起初我完全不以为意，直到一卷文稿突然从衣服底下露出来。

以我多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我知道这将是我遇到的最不寻常的故事，即便我充分施展最大的想象空间，对教授的这一诡谲行为仍是无从解释。我必须得承认，就算是此时格鲁皮乌斯掏出一把手枪，缘于某种破绽百出的理由将枪口对准我，我也不会太过惊讶。可教授只是屈指指头敲敲那些文稿，不无自豪地说：“这些类似日志的文字记录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两百天的经历。现在再读这些，我也几乎认不出当初的自己了。”

我错愕地也可以说是如堕五里雾中地将目光在文稿和教授之间来回游移，他无疑就像一个战胜对手的决斗者在旁边欣赏我的手足无措。这样缄默了几分钟，直到我向他发问：“这些文稿的内容是什么？”

此时已经接近正午，第一缕阳光洒进西向的露台。老板娘从这家只有三套客房的旅舍里面走出来，看到我们的交谈还没有结束的意思，就建议我和我的客人先吃她做的意大利面，完后再聊。

等莫雷蒂太太离开，我重拾我的问题，但格鲁皮乌斯避而不答，只是反问一句，一开始我都没有听明白：“您是一位虔信的人吗？”

“您是指信奉上帝吗，我不是。”我回答说，“如果您想问我不是教会的追随者。”

教授点点头。“我就是这个意思。”稍作迟疑他说，“有可能，我的讲述会刺痛您的心灵，或许会更多，您的信仰由此而被震撼，从此之后以另外一个视角看待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神秘兮兮的教授一直处于无所适从状态下的我试图从他说话的方式、从他有节制的手势中得出某种结论——可是说实话，我没有成功。我对格鲁皮乌斯投注的注意力越多，他的举止就越让我迷惑，越来越被他的话所吸引。我完全猜不出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如果他不是精神不正常的话——而我确实也不这么认为，那么他一定经受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历险。

“有人给我一千万欧元作为封口费。”教授淡定地说，从他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但愿您已经拿到了那笔钱。”我的口吻带些嘲弄。

“您不相信我。”教授说，他似乎很失望。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忙不迭地申明，“我只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问我是否是个虔诚的信徒这一问题时似乎就暗示了某种方向；不过，我已经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听说过无数和教会有关的丑闻，其中这个或者那个的事件甚至在某本书里有所展现，不外乎是梵蒂冈内的财政腐败、修士搞大了修女的肚子或者有家专为甘于受虐的僧侣提供特殊服装的邮购商店，还有什么能让我更加吃惊的呢？

格鲁皮乌斯坐在椅子上，伸长脖子，越过栏杆朝特雷图广场方向张望。然后他转身面对我说：“请您谅解，我的举动有些反常。我一直饱受被人追踪的这种妄念的折磨，但等您听完我的故事之后，您就不会为此怪罪我了。您瞧见下边的那两个人了吗？”格鲁皮乌斯的脑袋朝下面的街道歪了歪，只见两个黑衣人站在一辆不显眼的车前正聊天。我手扶栏杆朝下看去，那两人似乎不经意地将后背扭向我。

我们的对话暂时搁置下来，老板娘以一个意大利厨娘惯有的那

种满脸堆笑为我们端上两份意大利面，与之佐餐的是当地自产的葡萄酒，饭后是一杯香浓的不加糖的研磨咖啡。

此时安静极了，周围那些房子上高大且多是绿色漆框的窗户大都关闭着。那两个黑衣人已经不在房前，而于距离好几百米之外的马路上悠闲地吞云吐雾。一辆三轮小货车吱吱嘎嘎地驶过石子路面。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哑嗓的公鸡在鸣啼，似乎为自己的性命忧虑。从底层的厨房里传出洗碗机的隆隆声。

我旁边的这个男人抛给我一个谜题，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吃饭期间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严格地说格鲁皮乌斯并没有对我开启他生活大门的一丝缝隙。于是我老大不乐意地问道——毕竟是他找到我，是他要跟我讲些重大的事情：“您究竟是谁，格鲁皮乌斯教授？我还不能断定，这就是您的真名字。还有，您打算跟我说什么？您倒是快说啊！”

这似乎激励了格鲁皮乌斯，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慢慢抛却一直折磨他到现在的种种顾虑。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摞稿件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两手压在上面。

“我的真名就叫做格鲁皮乌斯，格伦高·格鲁皮乌斯，”他开始述说，话音小得我必须要扯着脖子才能听见，“二十四岁时我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到三十八岁时我已经在南德意志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教授。这期间我还先后在开普敦和波士顿的两个有名的医院工作过两年。简而言之，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对了，还有维罗尼克。在萨尔斯堡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上我遇见她，她在那里作女招待。她原本叫做维罗尼克，而她的父母——他们在城郊经营一家马车出租公司——一直管她叫维洛尼。她不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事情。我拿到博士学位的四个星期后，我们结婚了，婚礼是在米拉贝尔宫殿举行，四匹高头大白马拉着四轮马车迎接我的新娘。一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维罗尼克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被她的美貌迷住了，而她把我视作一个奇才，这自然让我很是得意。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说，就以这两点作为婚姻的基础实在是太过薄弱。我脑子里只装着我的事业，而维罗尼克之所以接受我也并不因为我

是她的生活伴侣，我充其量不过是她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她只是偶尔或者当她需要一大笔钱时，她会用爱来蒙蔽我。另外，孩子从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她常常这样说，孩子应该为此表示感谢，如果他们没有被带到这个可怕的世界上来。其实维罗尼克是在担心她的身材走样，我很确定。简单一句话，十年之后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即便我们俩谁都不想正视这个事实。我们虽然还一起居住在我们共同的房子里，那是城里的一套高级公寓，我们两个却各做各的，形同陌路，谁都没有尝试去采取措施来试图挽救我们的婚姻。为了能最终实现自己——她是这样表达的——维罗尼克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没过多久，她和她公司的第一位客户勾搭上了，让我觉得她很下贱，偏偏是跟一个生产酸菜罐头的工厂主。诚然，他的钱堆起来有稻草堆那么多，可以买昂贵的礼物取悦她。可是维罗尼克原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什么。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报复她，我把一个长得娇小玲珑、在放射科工作的助理带回家。她差不多比我小二十岁，维罗尼克突然推门而入，令还在床上厮混的我们受惊不少——她出其不意地回来——从那天起，我们两人之间积累多年的漠视骤变为对彼此的深仇大恨。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她眼里几乎要喷火的情景，她暴跳如雷：‘你竟然干出这等事，我绝不会饶了你！我要让你身败名裂。’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对她的这一威胁并没有怎么当真。可是事后，三个星期不到，也就是九月十四日，这个日子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因为就在这一天，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我猛然回想起维罗尼克的威吓，于是我……”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打断教授一直滔滔不绝的述说，是出于一种很奇怪的焦虑不安的驱使。我早已确信，此人无意蒙骗我。我对他的故事非同一般地被吸引，这么多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抑或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在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绝非只是一个普通的婚姻变故。格鲁皮乌斯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将一个陌生人扯进自己乱作一团的私生活，而我对教授来说仅仅是一个陌生人而已。而且我从他身上看不出那种怨天尤人、企图索取别人对他的同情、抱怨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的心态。我请求教授允许我做笔录。

“您没有必要这样做，”教授说，“我来这里找您，正是想把我的那份手稿留给您。我想，它在您手上才是一个合适的归宿。”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教授，您打算用您的故事换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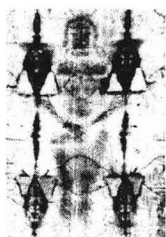
“钱？”格鲁皮乌斯苦笑着说，“钱我已经足够多了，像我之前说过的，有人给我一千万欧元的封口费——当然，那个时候还没人知道这故事该如何结局呢。不，我不要钱，我只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而在遣词造句上面您一定比我做得更好。”

“真相？”

接下来的时间里格鲁皮乌斯说话不再拐弯抹角，在他刚开始叙述时言辞还有些不太连贯，后来越来越顺畅，通篇故事贯穿着匪夷所思的阴谋和诡异的事件。等他终于讲完，已经午夜时分，我和他对视良久。格鲁皮乌斯将杯里的酒一口喝光，说道：“谢谢您听我说了这么长时间。”他站起身又说，“我想，我们这辈子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微笑着说：“没准是在下辈子呢。”

格鲁皮乌斯与我握手告辞，然后消失在茫茫黑夜。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太不可思议了，我心说，我来意大利是为了构思一部新小说，没想到却白白得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注定会让那些人们绞尽脑汁编撰出来的虚构情节黯然失色。



一千六百克颤颤悠悠的褐色内脏组织泡在冰冷的晶状溶液中——这副人体肝脏置于一个大尺寸的铝箱子里，箱盖上贴有“欧洲器官移植中心”字样的标签，正在从法兰克福运往慕尼黑的途中。夜里两点三十分，司机在位于特奥多尔码头附近的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大学附属医院取走这个铝箱子。此时此刻，运输车在通往慕尼黑方向的高速公路上疾驰飞奔。

一般来说，运输捐赠的移植器官都是走航空，因为慕尼黑实行夜晚空中管制，所以只能取道高速公路。ELAS——欧洲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分配电脑派位系统——经过排查确定，古文化学者阿尔诺·施雷辛格成为可能的接受者，经由慕尼黑医院三名医生构成的特别小组再次审核之后这一人选被最后确定。施雷辛格，四十六岁，列于等待肝移植的病人名单上已经四个月之久，六个星期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就属于器官移植备取二级，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他的肝严重受损。

通常器官捐赠者的名字不能对外公布，唯一可以知晓的信息是此人因遇车祸当场不治而亡，脑死亡时间大概是夜里十一点。捐赠者的血型呈 AB 阴性，和慕尼黑医院的肝患病人 A. 施雷辛格的抗

原体相吻合——ELAS 的数据库可以立马调出病人的详细资料。

格伦高·格鲁皮乌斯教授，他的资历虽浅，却是移植外科界赫赫有名的主刀大夫。凌晨五点三十分，他被值班医生林哈德助理的电话从床上叫起，他冲完淋浴，喝进一杯速溶咖啡，穿上裁剪合体的双排扣灰色西装，将与其搭配的领带在镜子前打好，然后出门，开着他那辆深蓝色美洲豹从慕尼黑的别墅区绿林园往北部驶去。

路面湿滑，虽然没有下过雨，灰蒙蒙的天空预示今日会是一个大阴天。这将是 he 时间不长、但却一帆风顺的主刀生涯中第十六个或者第十七个肝器官移植手术，格鲁皮乌斯一如既往地兴奋和期待着。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行车川流不息，他丝毫不以为意，飞快地穿过路口，没有留意到自己闯了红灯。当新闻播报以色列又发生一起恐怖袭击时，他关掉收音机。

值班医生已经把参与手术的其他医护人员召集起来。像这样的紧急事件一般都有应急方案，而这个方案一旦开始启动，就会以精准的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夜班护士在六点左右将施雷辛格从睡梦中唤醒，由当班的住院医师最后一遍向病人解释即将进行的手术内容，然后女麻醉师给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

几分钟之后，欧洲器官移植中心的司机和格鲁皮乌斯教授先后拐进林登大道。格鲁皮乌斯将车子开进后面的员工停车场。法兰克福的司机把装有肝脏器官的铝箱子送到急诊门口，已经有相关人等候在那里。

从捐赠器官抵达医院到移植手术开始，这中间一般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在这个清晨，连对这副紧急送来的肝脏再次进行检查化验的时间都没有。七点十分，第三手术室各项准备已经完成，只等移植手术开始。

格鲁皮乌斯在住院三部的茶室抓紧时间快速吞咽下一顿简单的早餐，两个涂抹奶酪的小面包、一杯酸奶和几杯咖啡。之后他走进手术室前厅，换上手术服，冲洗双手。他不是一个能早起的人，而他周围的同事们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对他说了声“早上好”就算打过招呼，十分体贴他此时的精神状态。

当教授七点十五分走进手术室的时候，由五位医生、两名麻醉师和四个护士组成的手术团队早已一切就绪。病人裸着上身仰面朝天躺在绿床单上。格鲁皮乌斯朝女麻醉师做个手势，意思是她可以开始了。几分钟之后麻醉师点头示意，教授操起手术刀，在病人前胸划开第一道口子。

格伦高·格鲁皮乌斯教授头一个走出手术室进入前厅，这时都快中午了。他摘下口罩，端着两只胳膊，像是一个被警察架着走的罪犯。他身上的绿色手术服血迹斑斑，一名护士走上前来帮教授脱下塑胶手套和手术服，手术小组的其他成员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前厅，现在的气氛就轻松多了。

“我的病人和我向你们大家的协作努力表示感谢！”格鲁皮乌斯把一只手搭在前额行了个军礼，然后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脸上挂着黑眼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最近几天格鲁皮乌斯睡得很少，就算睡着了，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这倒跟他责任重大的工作没有关系，主要因为维罗尼克，她让他的生活成了地狱。也就是从这些天开始他起了要除掉维罗尼克的念头，不管用什么方式，作为医生他知道的办法当然多种多样，但当他的头脑清醒的时候，他又为自己竟然能冒出这一恶念而懊悔不已。他的心绪如麻，噩梦连连，他知道，在这场两人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只能有一个完好无损地挺过去，不是他就是维罗尼克，一想到这些，就让他寝食难安。

十八年的婚姻生活可不算短，现如今大多数人的婚姻都维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却终于到了尽头。他们一定要彼此刀刃相向吗？一定要不择手段彻底毁掉对方的生活吗？他的事业能达到今天这样，他是多么艰难地一步步走过来——更别提耗费多少金钱了。而现在，维罗尼克竟然要把他辛苦得来的一切通通破坏掉？

格鲁皮乌斯正想打电话让人送进来一杯咖啡，摆在他面前的电话机却一阵铃铃作响。教授拿起话筒就说：“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不想被打扰……”话刚说到一半他顿住了，惊愕几秒钟之后他语气中分明带着几许慌乱轻轻地说道：“这不是真的，我就来。”

在同一时间，维罗尼克·格鲁皮乌斯走进英国花园附近的一家酒吧。她是这样一类女人，只要有她在，定会吸引在场所有人的眼球，而且不仅仅是男人的，即便在今天，一反她平时的习惯，她只是略施粉黛，一身黑色的裙装衬得她格外雅致。

这家酒吧广受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欢迎，他们多爱在这里聚集闲聊，中午这个时段还没有多少人，维罗尼克一搭眼在屋当间的桌子旁瞧到了那个秃顶瘦削的男人，他长得和他在电话里描述的一样，反正无论如何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私家侦探。

“格鲁皮乌斯夫人？”他站起身来问道，这样的称呼听起来怪怪的，但是倒挺符合这个衣着考究的男人的外表形象。

“雷维佐先生？”维罗尼克反问。

雷维佐点点头，他绅士地为维罗尼克拉出一把坐椅。

有那么尴尬的一刻，两个人相互打量起对方，然后维罗尼克微笑着说：“原来私人侦探长得就是这般模样啊，请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跟电视里面的完全不一样。”

雷维佐点头说道：“您以为会看到一个嘴巴上斜叼根雪茄、身穿皮夹克和牛仔裤的不修边幅的家伙吧！”说这话时他眉毛高挑，“我干这一行当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无损于我的办事能力，恰恰相反。”雷维佐从桌子底下拿上来一个扁平的文件夹，“请允许我给您看一下跟我的工作情况有关的材料。”

维罗尼克一边翻阅着文件夹里的各种委托函、感谢信和报价表（事实上这个家伙真是很能干），一边随意问道：“您做这行多久了？我是说，毕竟谁不是生来就当上私人侦探的。”

“四年，”秃顶说，“从前我是舞蹈演员的保健医师，更在此之前是国家剧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男朋友的去世让我悲痛欲绝，我无法做出脚尖旋转动作，再也不能凌空跳跃。我想，说起我的个人生活经历一定会让您觉得很没劲儿的。”

“怎么可能呢！”维罗尼克笑吟吟地把文件夹还给雷维佐。

“您在电话里只是略微提到您的事情。”雷维佐把话切入正题。